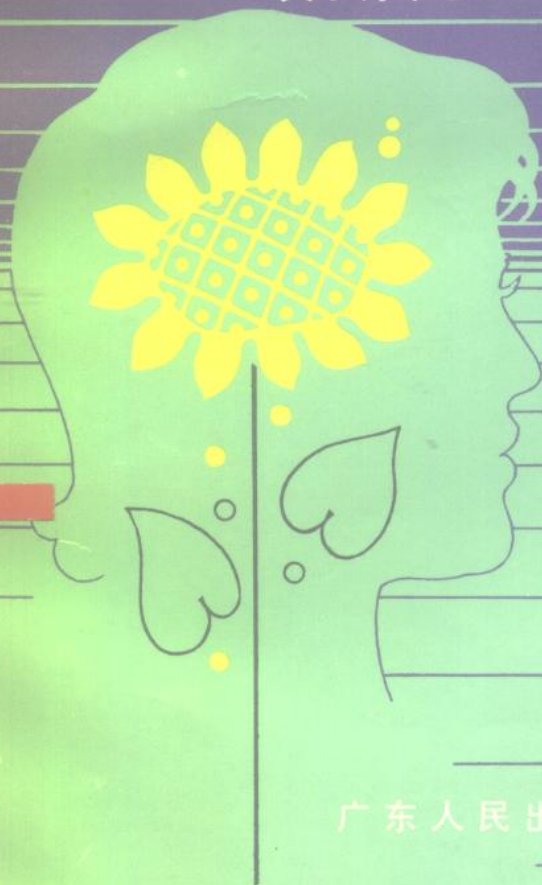


邵传烈 著

开启心扉的钥匙

——关于青年思想工作的十六封信



广东人民出版社

胡传利 著



2 025 6954 0



开启心扉的钥匙

——关于青年思想工作的十六封信



广东人民出版社

开启心扉的钥匙

——关于青年思想工作的十六封信

邵传烈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37×1092毫米32开本 3.875印张 1插页 76,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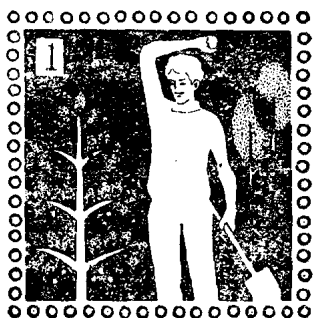
1934年8月第1版 193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4,900册

书号3111·644 定价0.58元

目 录

一、“救命”的报告·····	1
二、并非“大象屁股推不动”·····	8
三、思维是“地球上最美的花朵”·····	14
四、丝瓜的价值·····	20
五、政策要开放，思想要排污·····	26
六、平等待人，知己知彼·····	88
七、研究一下“抗药性”问题·····	41
八、注重自我教育·····	48
九、唤起人的自尊心·····	56
十、“强化”的学问·····	65
十一、思想工作要不要有点弹性？·····	78
十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吗？·····	80
十三、美育是一种心灵的体操·····	89
十四、别开生面的“第二课堂”·····	98
十五、请保持“水源的清洁”·····	106
十六、管理也是一种教育·····	114
后记·····	121



“救命”的报告

——关于青年思想工作的第一封信

王涵同志：

久未和您通信了。前些时候您给我写的信，对我帮助很大。经过几年自学，我考上了F大学中文系。进校以后，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学习也很紧张，但半年多来，我总觉得生活中似乎缺少了一些什么。那就是思想、感情的交流。在我的周围，有些同学由于过去政治理论问题的波动，转而表示对政治不感兴趣，互相之间缺少热切的鼓励和关心，讲“实惠”的风气蔓延，追求物质享受的思想滋长。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编了几句顺口溜：“生活要幸福，命运不由人，考试求通过，拿到文凭万事休。”我劝了他几句，他却说：“少来这一套大道理。”兼职班主任和辅导员也不大过问这些情况，他们

是“学生上课我上班，学生下课我回家”。思想政治工作究竟有没有作用？似乎重新成了一个问题。我很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不知您能否抽出一些时间给我回一信？

秋 英

秋英同志：

很高兴地读到了你的来信。首先要祝贺您上了大学，在人生之路上，又开拓了一大步。歌德说过：“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浮士德》，第1部，第95页）我相信，你只要用辛勤劳动的汗水，不断浇灌生活之树，它必定会显得越加郁郁葱葱。

您来信提出的在新时期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很愿意就这个问题和您交换意见。不过，这是一个大题目。在一封信里，不容易把它说清楚。我建议，不妨多写几封信，每封信只谈一个问题，这样也许可以把意见说得清楚一些。这里，我想就在今天思想政治工作是否管用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请让我先告诉你一个关于“救命”的报告的故事。也许你会问：报告，难道也能救命吗？是的。北京师范学院李燕杰老师，就作过这样的报告。有一天，他正在检查女儿的功课。“嘭！嘭！嘭！……”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一个人手持介绍信走进来，请李燕杰到他们单位去作报告。李燕杰看了看自己的日程表，已经排得很满了。他准备婉言谢绝邀请。来人恳切地说：“李老师，您一定要去，我们这次是请您

去救命的。”原来他们那里有一、两个青年由于恋爱问题处理不当，很可能轻率地走上绝路，正迫切需要帮助和鼓励。李燕杰马上站起身来，紧紧握着那位同志的手说：“我一定抽时间去讲这一课！”李燕杰的报告当然受到青年们的欢迎，其效果从一位曾经感到绝望的青年写给李燕杰的诗里可以看到。诗是这样写的：“你吹去了我心田上的积雪，我不再消极彷徨；你鼓起了我生命的风帆，我在新生的征程上远航！”

其实，报告可以“救命”，这并不是个别的。下面，我再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陕西长安县杜曲公社夏侯大队女青年史媛，原来做广播员工作。一九七八年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不幸身受重伤，造成半身瘫痪。这使她掉进了痛苦的深渊。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史媛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由于这不治之症，两年多来，自杀的念头在我脑海中从未消失过，一想到自己不但青春要在病床上结束，而且生命也将在病床上结束，要过早地和一切的一切永别，我痛苦得寸心欲碎……”人民日报群工部的同志很快给史媛写了回信，对她深表同情，热情鼓励她振作精神，还亲切地对她说，在科学昌明、医药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半身瘫痪也许不是“不治之症”。信里还说，他们将与有关方面联系，一旦了解到有治这种病的医院或医生，再写信通知她。后来，人民日报群工部的同志在访问了北京医疗截瘫的几个比较有名的中医师后，将访问情况和医生的意见告诉了史媛，还寄给她中医院编的有关的小册子，供她参考。一九八二年一月，史媛又写了一封回信给人民日报的同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们

怀着一颗善良火热的心，解除了我精神上的痛苦……在你们热心真诚的开导下，我已经不再悲观了，决心象其他病人一样，振作精神，同伤残作顽强的斗争，坚强地活下去，做一个对四化有用的人。”

秋英同志，你读了上述两个材料，会有什么感想呢？我想，你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思想政治工作是一把打开心灵之锁的奇妙钥匙。当然，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那么简单。至于怎样才能找到那一把型号对路的钥匙呢？牵涉的问题很多，留待以后的通信中再谈吧。但由此也可以看到，思想政治工作是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的。

让我们稍为回顾一下历史。可以说，坚持做思想政治工作，正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之一。从井冈山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八年抗战、三年多的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我们的党之所以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一个重要的“法宝”就是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在井冈山时期，党首先在红军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毛泽东同志曾经总结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0页）周恩来同志也曾指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3页）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期间，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地。虽然经历了千辛万苦，

但是，红军战士坚持了下来。原因之一，就是在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思想政治工作。就是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了干部和战士，提高了他们的革命觉悟，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一部党史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坚持并善于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正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

那么，这条重要的经验，在今天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我以为并没有过时。但是，正如您来信所说，在生活中缺少思想和感情的交流，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种现象，恐怕不止是在大学里存在，在我们的工厂、企业、机关等单位里，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在饱尝十年内乱之苦后，往往易于产生一种“条件反射”：思想政治工作即“假、大、空”，说服教育即“空头政治”，向领导正确反映情况成了“打小报告”。其实，这些看法都是不正确的。“假、大、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在是非颠倒、黑白颠倒的反常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对说服教育的一种歪曲。“假、大、空”决不是思想政治工作。吓唬人和蒙骗人怎么能解决思想问题呢？如今，林彪、“四人帮”这几具政治僵尸已被扔进了历史垃圾箱，“假、大、空”受到了严肃的批判。但是，这决不是要取消思想政治工作。当然，历史条件不同了，情况发生了变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形式也应随之变化。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底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说要改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应当在新的历史时期摸索出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的途径，总结出开

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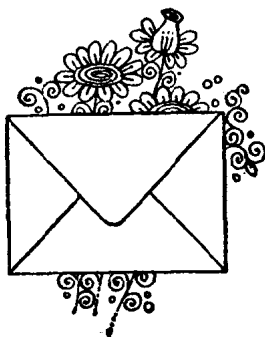
秋英同志，你在来信中还提及在部分青年中“讲‘实惠’的风气蔓延，追求物质享受的思想滋长”。这个问题的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些同志把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和物质鼓励的关系对立起来了。“思想工作三天三，不如奖金三元三”，此种议论，颇能说明这一点。我的意见是：物质鼓励与思想教育，两者不可偏废。我们固然不要一听到“三元三”，就象遇到瘟神一样避之不及，为了更好地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对超额劳动和做出优异成绩的职工给予一定的报酬，发些奖金是必要的，多劳多得也理所当然；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因为有了“三元三”，便可以贬低或取消思想政治工作。如果放弃思想政治工作，把多发奖金作为调动群众劳动积极性的唯一动力，那就不但不能调动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且会促使人们“一切向钱看”。现实生活中无数事实都证明：“三元三”不能取代“三天三”。李燕杰对于那些在爱情生活中受过挫折的青年，人民日报群工部的同志对于史媛，送去了一席令人激奋的谈话、一纸充满同志情谊的书信，却收到了千金难买的效果。不是吗？炽热，可以温暖那冰冷的心田；关怀，可以使希望的新苗重新生长。同志之间的友谊，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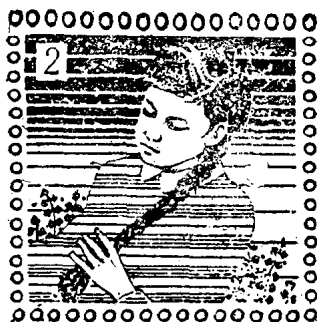
末了，我还有一点建议：不要做生活的旁观者。班里的同学来自各地，由于刚刚相见，彼此不很了解、熟悉，言语不多，也在所难免。这种现象是暂时的。你觉得生活中不能缺少思想、感情的交流，那就从自己的行动做起吧！即使对方

一时不理解，传回“少来这一套大道理”的讯息反馈，也不必气馁。你不妨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方法有没有毛病？如果以为自己所说的没有错，那就应该继续做一个思想工作的有心人。我相信你一定会获得成功的。

就此打住！

你的朋友 王涵





并非“大象屁股推不动”

——关于青年思想工作的第二封信

王涵同志：

感谢您对我的鼓励。读了您的来信，促使我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不做生活的旁观者的要求无疑是对的，但这谈何容易！就我接触到的一些人与事而言，包括一些从事青年思想工作的干部，都以为“干预生活”实在是一件苦差使。他们概括了三句非常形象的话：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做起来难度之大，就象大象的屁股推不动；要召集青年开个会，他们就象猴子的屁股坐不住；要给青年提点意见，他们就象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对这三条，我也很有同感。特别是大学生，脑袋长在自己身上，谁还需要褓姆？最近，我们班里的团支部改选，我被推选为团支部书记。这下子，可叫我犯难了。不担

任吧，说不过去，这是大伙对我的信任；担任吧，我完全缺乏做思想工作的经验，加上这是一份惹是生非的工作，做得不好，是顶着石臼演戏——吃力不讨好。我思想斗争了一个晚上，决定硬着头皮试一试，准备碰个鼻青眼肿退下来。你同意我的想法吗？我等待着你的复信。

秋 英

秋英同志：

我很赞赏你这种知难而进的勇气。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勇敢产生在斗争中，勇气是在每天对困难的顽强抵抗中养成的。我们青年的箴言就是勇敢、顽强、坚定，就是排除一切障碍。”（《奥斯特洛夫斯基两卷集》，第2卷，第848页）如果你觉得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几句话说得不错，我建议你把它当作座右铭，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这样说，并不是意味着可以忽视开展思想工作中碰到的许多具体困难。你在来信中谈到的“推不动”、“坐不住”、“摸不得”的现象，在一部分青年中，是确实存在的。但对这些现象，要作具体的分析。

依我之见，在目前的新时期下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确有着与过去时代不同的特点。这一代青年，生在红旗下，长在动乱中，他们在心灵上程度不同地留着十年内乱遗下的伤痕。世态炎凉，人情淡薄，现实的缺陷，在一部分青年人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但是，这些情况是不是不可逆转的呢？或者说，思想工作对他们来说完全是无能为力的呢？我的看法是并不如此悲观。我始终相信，有一分耕耘，就

有一分收获。大学生虽然不需要“保姆”，但思想教育却少不了科学的“灌输”。这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在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天津、北京一些院校的少数学生，编辑出版了一本具有严重错误倾向的文艺刊物。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者陈建功也参与了其事。这本刊物出版后，受到了多方面的严肃批评。北京大学党委得知后，派了一位负责同志跑到学生宿舍，和陈建功促膝谈心。这位负责同志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没有用大帽子去吓唬陈建功。他肯定了同学们的热情，而着重联系实际分析了这本刊物在思想政治倾向方面的缺陷。陈建功在入学前，在京西矿区当了十年采掘工人，由于家庭在十年内乱中蒙受了屈辱，使他对领导形成了某种戒心。可是，这次谈话使陈建功受到了巨大的感动：“我第一次见到了一个通情达理、不以吓人吃饭的共产党的书记。人非草木，岂能无情？何况他讲的不无道理。”陈建功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党委负责同志对他的批评。在这次谈话后，陈建功萌生了入党的要求。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这位有才能的青年作者被吸收入党了。他在大学毕业时，给北京大学党委写了一份情真意切的思想汇报，其中有如下一段话：“我们过去有意无意地认为我们自己比党高明，而对党在十年内乱中犯过的错误，党在拨乱反正中走的艰难道路，显示了我们全部的事后诸葛亮的‘才能’。我们从来没有对那个时代的自己进行一下深刻的反思。其实，拯救了中国革命的，不还是中国共产党吗？我们每一个青年人，难道还不能对个人和时代、个人和党、个人和人民的关系，作

一下冷静的估价吗？”读了这一段话，我想，你一定也会十分感动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成功，不仅不会“惹事生非”，而且能帮助人们分清是非。你应当把担心换成信心。

成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在生活中几乎到处可以见到。清华大学团委的同志们还告诉我，在一九八〇年，一个所谓人才学专家来校作了一个充满错误观点的报告，鼓吹个人奋斗的自我设计、自我成才等等，受到许多学生的欢迎。学校领导发现了这个问题后，采取有力的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把这位“专家”的言论作了有理有据的分析，使同学们看清了问题的实质，从而增强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到了1981年，有一位音乐家来校讲演琵琶，他在介绍音乐和自己出访三十余国的演出情况时，散布了不少崇拜洋人、贬低祖国的错误观点。这次慕名而来欣赏他演奏的二百多学生，绝大多数认为，他的讲话“缺少中国人的志气”。在他讲话中间没有一人鼓掌。不少人中途陆续退出会场。事后，校学生会还根据同学们的意见，给这位音乐家写了一封信：“您的观点不能给人带来好的影响，尤其是在国家困难时期，在我们为国家富强发奋尽力的时候，需要的是力量，是热情，而不是消极的抱怨与盲目的羡慕。”

从陈建功的进步和清华大学学生们思想面貌的变化，足以说明，认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工作“大象屁股推不动”，根据并不足。看来，问题在于怎样“推”。

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是教育人的工作。高尔基曾经说过，文学是人学。把

高尔基的话引伸一下，我以为思想工作也是一种“人学”。要做好人的工作，一个重要前提是端正对人的态度。教育者要先受教育。尊重人、信任人、关心人，包括向工作对象学习，这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学”的第一章。因为人是非常复杂的机体。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属性、自然的属性，在阶级社会中又有阶级的属性；人们之间又有各种各样的关系：生理的关系、社会的关系，在阶级社会中还有阶级的关系。这些属性和关系，又会随着不同的条件而发生变化。由于这种变化，人们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不过，人的思想的变化，不是无章可循的，同样存在着可以认识的客观规律。只要你认真掌握了人的认识变化的规律，因势利导，顺水推舟，那么，许多思想问题并不难解决；反之，如果你对人的属性和人们之间的关系不甚了了，或者粗枝大叶地站在远处望一望，就匆匆忙忙地动手去解决矛盾，那就好比医生不问病情就开方子，摄影记者不调节光圈就拍照片，结果往往十之八九不成功。

这里，我还想说几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的话。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转变人的思想。这也就是说，用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即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教育广大群众，启发和提高人们的革命自觉性，使他们确立正确的立场、观点，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克服那些错误思想。但是，如果不讲究方式方法，自己以高明自居，一味“我说你服”，“我打你通”，

别人就会受不了，思想政治工作也就不能取得相应的效果。只有牢牢树立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平等待人，因势利导，既做群众的学生，又做群众的先生，思想政治工作才能转化为建设四化的巨大物质力量。

秋英同志，“大象屁股”也是推得动的，你说对吗？

王 涵

